

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

• 王友琴

一 題目和背景

本文將描述和分析1966年在全中國學校裏發生的學生打老師事件。如果不從道德是非及進步原則出發，而僅僅以生活變動的劇烈程度來衡量，那麼這個事件確實可以算是「革命」。事實上，這也是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部分。

在1966年夏天，中國的報紙每天熱烈支持並大版報導當時「革命學生」和「紅衛兵」的活動，但是，對學校裏正在發生的大量暴力行為甚至打死人事件，卻從不報告，隻字未提。

1978年後，報紙雜誌刊登了一些在「文革」遭受迫害而在「文革」後平反的人物的文章，但他們多為高級幹部或知名人士。至於在「文革」中被打的老師，雖然人數很多，但社會地位不高，所以在「文革」後也輪不上被報紙報導。

在現已出版的兩本長篇「文革」通史中，《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僅僅記述了1966年8月下旬後學生紅衛兵在學校外的暴力行為，卻未提8月初就開始的在學校內的大量暴力行為^①，於是也就未能說清暴力行為如何在學校內先興起並蔓延到學校外的過程。另一本《大動亂的年代》簡單地談到1966年夏中國學校裏的情況說：「大學、中學、小學教師受凌辱者數以萬計。北京中、小學的若干教師被剃了陰陽頭。」^②作為數量詞，「若干」顯然少於「萬」，照此讀來，「陰陽頭」似乎就算當時的「凌辱」中的最壞情況了。但是，實際情況遠非如此。

本文試圖寫出這一段不該為人所忽略的歷史。

在1966年夏天，中國的報紙每天熱烈支持並大版報導當時「革命學生」和「紅衛兵」的活動，但是，對學校裏正在發生的大量暴力行為甚至打死人事件，卻從不報告，隻字未提。

* 在這裏，我向所有的被訪者表示感謝，他們花費了寶貴的時間來作這種恐怖而痛苦的回憶。特別要感謝王晶堯先生，他在妻子卞仲耘被打死後，調查情況，收集材料並冒險保存下來。他讓我閱讀他的材料。他對妻子和歷史的忠誠精神令人欽佩。也特別感謝 John Kieshnick，是他幫助我作了在計算機網絡上的調查，並對本文的寫作給予鼓勵。

二 材料和來源

幾年來，我向一百多位「文革」經歷者詢問他們是否知道當時學校裏發生過學生打老師的事情。除了面談，還在計算機網絡上作了問卷調查。被訪者大多是1966年的在校學生，有一些則是當年的老師，少數幾位是被打死或被嚴重打傷的老師的直系親屬。在當時的在校學生中，大部分是中學生，也有大學生和小學五六年級的學生。

據這些被訪者說，他們不知道在「文革」中究竟有哪個學校的學生是沒打老師的。就我調查所得的76所學校名單中，在「文革」期間都發生過學生打老師的事件^③。

被訪者提供的見證的可靠性如何呢？這些被訪者大多屬於不被准許或者不願意參與打老師的學生。他們是目擊者，但對整個事件可能了解得不够深入或全面。至於那些打過老師或牽涉較深的人則不願談此話題，甚至根本拒絕談話。這些知道細節最多的人不能提供細節。挨過打的老師也大多不喜歡回憶「文革」，因為覺得實在太痛苦、太羞辱，他們有意無意地忘卻這段經歷。比如，1966年強迫「專政隊」裏人唱的「牛鬼蛇神歌」，幾位相當聰明、「文革」後在專業上也有新成就的老師，都告訴我不能憶及歌詞全文，儘管他們當年被迫每日必唱，他們埋葬了他們的記憶。本文所錄的歌詞和歌譜，是由一位1966年的初中二年級學生提供的。至於被打死者，他們再也無法說話。在這種情況下，本文所記，可能比實際情況有所減輕而不是誇大，只有大量遺漏而無增添。

除此以外，我的另一材料來源是私人收藏，如當時手寫的匯報，群眾組織油印鉛印的「大字報選編」、「大事記」等。另外，我系統閱讀了當時的正式公開出版物，主要是《人民日報》。

因此，本文是由被訪者的口頭敘述，實錄性資料，以及當時的官方出版物三者相結合、對比、印證寫成的。

三 學生是怎麼打老師的？

(1) 規模和程度

1966年8月5日下午，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屬中學高中一年級的學生發起「打黑幫」，那天打鬥了三位副校長（當時正校長缺）、一位教導主任和一位副教導主任。在戴高帽子、往身上潑黑墨、敲簸箕遊街、掛黑牌子、強迫下跪、強迫挑重擔子之後，又用帶釘子的木棍打，用開水燙，等等。在大約三個小時的折磨之後，第一副校長卞仲耘失去知覺，倒在學生宿舍樓門口的台階上。儘管醫院就在學校對門，但她卻在兩個小時後才被送去，那時人早已死了，而其他四位老師也被嚴重打傷。卞仲耘是北京第一個被學生活活打死的老師，死時50歲，已在這所中學工作了17年^④。

在這以前，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的學生就已打了校長，強迫她敲着破臉盆喊

據被訪者說，他們不知道在「文革」中究竟有哪個學校的學生是沒打老師的。就我調查所得的76所學校名單中，在「文革」期間都發生過學生打老師的事件。

1966年8月5日下午，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屬中學高中一年級的學生發起「打黑幫」。在大約三個小時的折磨之後，第一副校長卞仲耘失去知覺死了，她是北京第一個被學生活活打死的老師。

「我是牛鬼蛇神」，把她的頭髮亂七八糟地剪光，然後將她打得頭破血流，並要她在地上爬。1966年8月4日，北京第四中學的學生發起批鬥學校領導人。他們在操場上押着當時所謂的「黑幫」繞圈子。有人朝他們身上灑墨水、給他們戴高帽子，甚至有人動手打他們。北大附中和四中是北京兩所有名的中學，打人的消息馬上就傳開了，其他學校起而仿效。師大女附中打得略晚，但卻打死了人。

1966年8月17日，北京101中學學生打死了其時被判監外執行徒刑的美術教員陳葆昆，有學生燒他的頭髮。他被打昏後又被扔進噴水池，面朝下淹死。同時，學生還打了十來位老師。這些老師被強迫在煤渣鋪的路上爬，膝蓋流血，一邊爬，一邊被打。其中女老師的頭髮被剪掉一半，留下一半，當時稱為「陰陽頭」。

在北京師範大學第二附屬中學，學生打死了學校的共產黨支部書記姜培良，打的時候強迫他14歲的兒子打父親，還有人叫「拿鹽去」撒在他傷口上。校長高雲的額頭上被按了一排圖釘，站在烈日下被學生潑開水。還有一位語文老師被打裂了肝臟隨後死去。一個學生的母親也被打死，因為她給兒子的一封信被同學看到又被認為是「反動」的。

在清華大學附屬中學，校長被銅頭皮帶打得滿身是血，一位副校長曾被初中二年級的一個班的學生排隊每人用皮帶抽幾下。被紅衛兵裹脅在內的這個班的學生不敢不打。學校女共青團團委書記被打瞎了一隻眼睛，一位化學老師被打後從煙囪上跳下來自殺身亡。

在北京中山公園的音樂堂裏，北京第四、第六、第八中學學生聯合批鬥校領導，學生在舞台上掄開銅頭皮帶打被鬥者。他們口頭批判一陣，喊一陣口號，掄一陣皮帶，如此輪番進行。在這座音樂堂裏，北京東城區的一些幼兒園老師也挨了鬥和打。

1966年8月24日，清華大學紅衛兵組織了清華大學附屬中學、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等十多所中學的紅衛兵到清華大學，撕去了他們認為是「右派翻天」的反國家領導人的大字報後，強迫清華大學「專政隊」裏的學校領導和教授拆掉石頭建的老校門，並開始在那兒抄家打人。比如，打了清華無線電系的書記、主任、教授，血流在地上，有人還在血迹旁畫了一個大圈，寫了「狗血」兩個字。那一天，他們還抄了北京大學教授翦伯贊的家，撕了他的書和畫。大學裏原先已有武鬥現象，但不如中學厲害，所以這一次是中學生去大學校園打。

在小學，學生年齡最大的是13歲左右。在北京禮士胡同小學，一位班主任被學生逼迫吃下大頭針和屎球。北京玉泉小學學生用皮帶抽了四位女老師，又把她們的頭髮剪去一半。北京寬街小學的校長郭文玉被打死。

在首都之外的天津南倉中學，學生給老師頭上戴字紙篋，往他們的襯衫上打黑叉，女教導主任的頭被剃得像洗衣服的搓板。上海復興中學，學生用榔頭打老師的頭，其中一位老師的頭蓋骨被打裂；上海第三女子中學的校長，被學生用一些圖釘把大字報釘在她背上，還強迫她在掃廁所時吃屎尿。在揚州市灣頭公社小學，學生們交流怎麼用皮帶抽人的經驗。

在北京禮士胡同小學，一位班主任被學生逼迫吃下大頭針和屎球。北京玉泉小學學生用皮帶抽了四位女老師，又把她們的頭髮剪去一半。北京寬街小學的校長郭文玉被打死。打人的小學生當時年齡最大的只有13歲左右。



「文革」期間，學生強迫老師戴高帽子遊行是常見的鬥爭方式。

(2) 起源和蔓延

第一階段：從罵到打 1966年6月1日晚上，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7人的一張大字報，稱北京大學校長等人為「黑幫份子」。6月2日，《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稱北京大學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頑固堡壘」。隨後，很多學校開始模仿北京大學貼大字報。6月3日起，中共中央派「工作組」往各大、中學校，以取代原來的學校負責人領導學校的「文革」。

「工作組」讓學生停了日常課程，揭發批判學校的「問題」。1966年6、7兩個月裏，「工作組」把各學校和學校裏的老師，特別是領導人，劃成四個類別。第四類就是運動的重點打擊對象。運動的主要方式是大字報揭發和開批判大會，教師被迫集中交代問題。部分學校有一半以上的老師都被大字報點名。很多老師被說成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或被罵作「豬」、「狗」（見「大字報」抄件），不允許自我辯護，也不允許質疑批判所用的準則。同時，運動重點對象被罰勞動，和其他人分開，等候最後處理。

但是，「工作組」在理論上不許學生打人。1966年6月10日、11日，清華大學一些學生成立「打狗隊」，打「狗」即打人^⑤。6月18日，北京大學一些學生設「鬥鬼台」，60多個「黑幫份子」被戴高帽子、罰跪等。這些事後來都被「工作組」反對。

這一時期中學的打人情況，可見於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副校長卞仲耘在1966年6月29日寫給上級的信。她在信中說，6月21日，「工作組」召開「揭發批判大會」，在會上，「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個小時：戴高帽子、低頭（實際上是將上身彎到和下肢成九十度）、罰跪、拳打、腳踢、用繩子反捆雙手，用兩支民兵訓練用的步槍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裏塞、往臉上抹，往滿臉滿身吐吐沫」（見卞仲耘的信的底稿）。這一描述當為可信，因為她當時已被「工作組」劃成「四類」，在當時情況下，寫信人絕對不可能誇大。6月

下旬該校中四(三)班貼在她家門口的大字報說：「豎起你的豬耳朵聽着，你再敢胡作非為，千刀萬剮了你。」(見抄件)。

第二階段：從打到打死 1966年7月28日，根據毛澤東的決定，中共北京市委作出「關於撤銷各大專學校工作組的決定」(適用於中等學校)⑥。毛澤東批評「工作組」把運動搞得冷冷清清。於是，一些學生開始自己開批鬥會，公然大打出手，打傷甚至打死老師的事件發生了。在8月5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學生打死人後，該校文化革命委員會的學生負責人當天晚上到北京飯店當面報告給中共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吳德⑦。吳德如何上報給更高級的領導不得而知，但是以後未見他們採取任何措施制止，打人繼續升級和蔓延，於是便出現了上節所描繪的情景。我們現在不知道全北京有多少老師在1966年8月被打死，只知道僅北京西城區(這是位於市中心緊靠天安門廣場的一個區)，就有7個中學校長被打死。

第三階段：從校內打到校外，從北京打到全國 1966年8月22日，中共中央同意公安部關於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規定⑧。這時，北京的學生已經從校內打到了校外，作家老舍就是在8月23日被中學紅衛兵毒打後自殺的。其時距卞仲耘老師被打死已經有18天。當時北京的中學裏流傳一句話：「打死個人，叫家屬拿28塊錢就是了。」——這是火葬場的價錢。到底學生打死了多少人呢？根據1980年12月20日的《北京日報》，僅1966年8、9月的統計，在北京被打死的有1,772人，被抄家的有33,695戶。但是報紙只提到這個數字，並未說及死者的詳情。

打人風傳往全國。北京的紅衛兵到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到北京，進行「串連」。比如，8月11日，一些北京的紅衛兵來到上海外語學校，把那裏的「牛鬼蛇神」揪出來打。8月12日，此校的學生已學會了打這些「牛鬼蛇神」，剃他們的陰陽頭，並叫他們舔自己流在地上的血。上海市上海中學的一名前紅衛兵說：

北京紅衛兵南下，穿着軍裝，繫着武裝帶，非常神氣，對我們說：「你們這裏怎麼這麼文質彬彬，一點革命氣氛都沒有？」我當時弄不懂他們說的「革命氣氛」是指甚麼。一個北京來的女紅衛兵從腰上解下皮帶就開始示範怎麼抽人。這是我第一次看見北京紅衛兵的樣子。

從本文註釋③所列的學校名單可以看出，從較小的縣城直到人民公社，都發生了打老師和校長事件，但一般比北京來得晚。1966年底，在江蘇揚州灣頭公社中心小學，學生先鬥了校長，剪了「陰陽頭」。副校長張筠也不能倖免，她白天被拉出去鬥，晚上被關在一間教室裏不准回家，在除夕前她告訴丈夫說：「我被打得受不了。」第二天，也就是除夕那天，她投河自殺。

(3) 「打」法

(1) 戴高帽子遊街。這是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查報告》裏描述的鬥地主方式。這篇文章收在文革中非常普及的《毛澤東著作選讀》(甲種本)中，很多學生都讀過⑨。

根據1980年12月20日的《北京日報》，僅1966年8、9月的統計，在北京被打死的有1,772人，被抄家的有33,695戶。但是報紙只提到這個數字，並未說及死者的詳情。

(2) 拳打腳踢棍子打。

(3) 「坐飛機」，後來又叫做「噴氣式」，是「文革」的發明。鬥爭會上，被鬥者彎腰90°甚至更多，兩臂後舉，形似噴氣式飛機。

(4) 用帶銅頭的皮帶抽。當時紅衛兵的標準裝束是臂纏紅袖章，一身黃軍裝，外束皮腰帶，在北京又稱「板帶」。用皮帶抽人，上面的銅頭可以造成嚴重創傷，有人的眼睛被銅頭打瞎。

(5) 掛牌子。在被鬥者脖子上掛一大牌子，上寫「反革命黑幫」、「反動學術權威」，下面是此人的名字，名字上用墨水打一個大叉。

(6) 剃「陰陽頭」。這是另一項「文革」發明。學生把老師的頭髮剃去一半，留下一半，故名「陰陽頭」。特別被用在女老師身上。

(7) 建立「勞改隊」，又稱「專政隊」、「牛鬼蛇神隊」。被打入此隊的老師要在烈日下幹髒重活兒、掃廁所、掃街等等。

(8) 唱「嚎歌」，又名「牛鬼蛇神歌」，強迫「牛鬼蛇神」唱，因為他們不被當人，所以不是唱是「嚎」。「嚎歌」的詞和曲如下⑩：

$\underline{1} \ \underline{5} \ 1 \ 2 \mid 3 \ 1 \mid \underline{1} \ \underline{5} \ \underline{1} \ 2 \mid 3 \ 1 \mid$
 我 是 牛 鬼 蛇 神，我 是 牛 鬼 蛇 神
 $\underline{0} \ 0 \ 0 \mid \underline{0} \ 0 \ 0 \mid$
 我 有 罪。我 有 罪
 $\underline{6} \ \underline{5} \ \underline{3} \ \underline{3} \mid 2 \ 1 \mid \underline{3} \ \underline{3} \ \underline{2} \ \underline{3} \mid 5 \ 5 \mid$
 我 對 人 民 有 罪，人 民 對 我 專 政
 $\underline{6} \ \underline{5} \ \underline{3} \ \underline{3} \mid 2 \ 2 \mid$
 我 要 低 頭 認 罪
 $\underline{3} \ \underline{3} \ \underline{2} \ \underline{3} \mid 5 \ 5 \mid \underline{6} \ \underline{5} \ \underline{3} \ \underline{3} \mid 2 \ 1 \mid$
 只 許 老 老 實 實，不 許 亂 說 亂 動，
 $\underline{3} \ \underline{3} \ \underline{3} \ \underline{2} \ \underline{3} \mid 5 \ 5 \mid \underline{6} \ \underline{5} \ \underline{3} \ \underline{3} \mid 2 \ 1 \mid$
 我 要 是 亂 說 亂 動，把 我 砸 爛 砸 碎，
 $\underline{5} \ \underline{5} \ \underline{6} \ \underline{6} \mid 0 \ \underline{7} \ \underline{7} \mid \text{--} \parallel$
 把 我 砸 爛 砸 碎。

紅衛兵強迫那些被打入學校「專政隊」的人唱，唱得不好就打。據北京第四中學的學生說，這首「嚎歌」是北京第四中學的一個學生在1966年8月作的，後來迅速流傳到各學校，以至全國。

(9) 抄家。成群闖進老師的家，拿走老師的私人財產，特別是書籍。把老師的日記、私人書信，乃至情書等，拿去公布並上網上線批判。

上面九種方式，在上述的學校中曾普遍發生。此外，各校還有不同的手法，比如用開水燙、用屎尿澆、用火燒、往身上倒髒水，讓「牛鬼蛇神」站在架高的桌子椅子上，推倒桌椅使其摔下，等等。有些學校，比如北京第六中學還

自設刑室。北京景山學校的一名紅衛兵說，他們曾因打人不夠狠而被組織去北京第六中學參觀學習這個刑室，她看到刑室的地上血迹斑斑，牆上用血寫了「紅色恐怖萬歲」。

(4) 誰被打？

從1966年6月初開始，大學和中學教師隊伍就整體地被列為運動對象。當時學生對老師的態度很快就發生了變化。學生見老師不再問好，有的直呼全名，甚至用帶惡意的稱呼。在1966年6、7月間，若有學生客氣地說話，老師就有受寵若驚之感。大字報可以亂罵任何老師。在8月之後，老師甚至學校的工友，成了隨時可能挨罵挨打的人，他們無處尋求保護。

但是並不是所有老師都被打。被打的主要有三種人。

(1) 學校的負責人。比如，上面寫到的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屬中學的「八五」慘案，除了一名管總務的副校長和一名總務主任外，其他五名校級負責人都被毒打，罪名是「反革命黑幫」。

(2) 業務強、有經驗、教書教得好的教師，當時被說成是「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

(3) 個人歷史或家庭出身「有問題」的，或在1957年「反右」時被定了甚麼的老師，儘管事實上文革前的多次政治運動，已經清洗了教師隊伍。

這三種被打的人，是由當時的大政策決定了的。但是，所謂的「黑幫」和「資產階級權威」，在當時有此新名詞而沒有明確定義。因此，在中學裏，年齡40歲以上，月薪100元以上的老師，就很可能被打。

當時《人民日報》社論用「牛鬼蛇神」一詞指代「敵人」^①。至於甚麼是「牛鬼蛇神」，並不曾有明確的定義。但是高帽子、黑牌子、「嚎歌」、「陰陽頭」，弄得被打的老師看起來確實有如「牛鬼」、有如「蛇神」。

不過，對個人來說，被不也被打也有相當的偶然性。因為地位只是相對的，一所較大的學校的一般幹部或教師，到了一所較小的學校就可能成為第一負責人或業務尖子，儘管級別不高，亦會被打。另外，據被訪者們說，老師還因各種不同的原因被打。有的老師被打，是由於給某個學生不及格，而這個學生又恰恰是打人的活躍份子。有的則因曾得罪學生而被打，北京第十五中學的一個學生把一個女老師打得慘叫着滿地爬，原因是這個老師曾在一次代課時批評這個學生。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有個工友平常對學生較兇，也被打得起不了牀。南京外國語學校有一位老師被打，是因為他信教。有的老師長得漂亮，比較顯眼，遭人忌恨，於是被打。有的老師長得醜陋，看起來像電影上的壞人，也被學生打。

面對皮肉之苦和人格污辱，老師們不能作任何反抗的行為，否則馬上可能被打死。他們怎麼辦？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的一位教授說，他被拖去遊街時，「我告訴自己這是胡鬧，總會過去，不必介意」。廣州第二十五中學的一位老師說，他一向喜歡運動，有點武功底子，學生打的時候，他往下一蹲，兩手把腦袋一抱，運運氣，任憑學生打，總算傷得不厲害。

北京景山學校的一名紅衛兵說，他們曾因打人不夠狠而被組織去北京第六中學參觀學習，她看到刑室的地上血迹斑斑，牆上用血寫了「紅色恐怖萬歲」。

物理學教授、畫家孫菊生說，1966年他在北京建築材料工業學院當過「勞改隊」第三隊副隊長。這所大學是比較小的，可是「勞改隊」裏面還至少有三個分隊之多。他的姐夫是北京鋼鐵學院的教授，在鋼鐵學院裏挨打挨鬥。他的姐姐逃到他家，正逢附近中學的紅衛兵在打孫菊生，就把孫的姐姐打死。究竟有多少老師那時被打呢？據有的被訪者估計，不算那些挨過零星幾腳幾拳的老師，在「文革」中「正式」（找不到更合適的詞）進了「專政隊」被學生當做「敵人」打的，約佔整體老師數目的10%左右。有的認為比例高於此數。

(5) 誰打？

從1966年6月開始，學生要罵老師「黑幫」、「反革命」，儘可以罵。8月以後，甚至可以隨便打。罵和打當時都被看做「革命」行為，法律已不起束縛抑制作用。但是，雖然老師們可以被隨便打，能有資格參加集體性打人的，只是學生中的紅衛兵。

打人是一種「革命」特權。據在1966年時是北京朝陽區一中學學生的一位被訪者說：「我媽媽是革命幹部，可是我爸爸1957年當了右派，他們不准我參加紅衛兵，鬥人抄家也不能去，當時覺得很遺憾。」當時的紅衛兵規定，只有「紅五類」子弟才能參加這些批鬥活動。這「紅五類」是革命幹部（北京曾規定1945年以前參加共產黨的幹部才算）、革命軍人、革命烈士、工人和貧下中農。

一些被訪者說，那時各校出現了一批「打手」，他們到處打，從中得到很大樂趣。其中有的專門管「牛鬼蛇神隊」，威風十足。這些「打手」不一定是紅衛兵組織的最高頭頭，有的大頭頭不動手，但也不制止下面的人打。這些「打手」中，有一些原來就性情兇狠，但也有一些平日在家裏或學校顯得壓抑，這時一反常態，比別人更殘酷，其中的心理原因值得探究。

有相當一些女學生掄皮帶抽人，打得很兇。北京第八女子中學的「牛鬼蛇神」站成一排，女紅衛兵用錘子挨個兒敲他們的頭。從註釋③的學校名單中，我們可以看到有幾所女校，也就是說，由女學生打死了老師。甚至在男女合校的中學，據一位目擊者說，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大打校長時，主打的是女學生。

另外，據有的被訪者說，初中二、三年級的學生打人最兇，不知是否和年齡有關。他們當時15或16歲。

據被訪者說，在北京、上海、南京、廣州這些大城市裏，幹部子弟多的中學打人最早也最兇。比如，北京的師大女附中，上海的復興中學和南洋模範中學等皆是。

在大多數情況中，打人是集體打的。很多人一起動手，或者一撥接着一撥打。學生人數是老師的十幾倍，只要其中一小部分動手就足以傷人。

也有一些不是「紅五類」又不是「黑五類」家庭出身的學生，比如因父親加入共產黨晚於1945年而當時不被算作「革命幹部」出身的，故而未被准許參加紅衛兵，在紅衛兵打人時，他們也去加入或幫忙。但一般是不被允許的。

「黑五類」家庭出身的學生那時被稱作「狗崽子」，有相當一部分被打。

從被訪者中，曾聽到老師的孩子打自己父母的個案。在上面寫到的北京師

從1966年8月以後，學生可以隨便打老師，當時被看做「革命」行為，法律已不起束縛抑制作用。但是，能有資格參加集體性打人的，只是學生中的紅衛兵。

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一個初一的學生被迫打父親姜培良。在很多學生紅衛兵打他父親時，他也用棍子一起打。父親被打死後，兒子因受刺激太大而致精神失常。據一位在1994年曾看到他的被訪者說，他仍然癡呆，不能從事正常的工作。

學生把老師整體性地看做運動對象，所以老師一般不被允許參與打老師，但是據幾位來自不同學校的被訪者說，也有老師挑動學生打別的老師，以報私忿。

縱觀「文革」中發生的學生打老師，可見以下特點：

第一，殘酷 有人可能會說，1967、1968年在各省發生的群眾性兩派「武鬥」，死人更多。但那些武鬥至少是雙方互打的，可以反抗，也可以退出。而1966年的學生打老師，老師不能還手，甚至也不能哀求投降以保性命。

第二，普遍 1966年的學生打老師，在我調查所及的學校中都發生了。現在還沒有找到一個例外。

第三，特殊 在教育史上，在法律史上，都無法找到可比的現象。

從被訪者中，曾聽到一個初一的學生被迫打父親。父親被打死後，兒子因受刺激太大而致精神失常。據一位在1994年曾看到他的被訪者說，他仍然癡呆，不能從事正常的工作。

四 發生的原因：「文革」經歷者的解釋

學生打老師，事出有因。被訪者指出的直接的發生原因主要有：

(1) 毛澤東的引導推動

1966年5月7日，毛澤東給林彪的信裏說：「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人民日報》1966年8月1日發表了這些話）。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委員會的「通知」，是「文革」的綱領性文件。在毛澤東寫的段落裏說：「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⑫ 6月1日晚廣播北京大學的大字報是毛決定的。

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學發生學生給被鬥人戴高帽子，並動手打人。北京大學「工作組」當天寫了「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將學生的行動稱為「亂鬥」。6月20日，當時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國家主席劉少奇批准轉發這一簡報，批語說「中央認為北大工作組處理亂鬥現象的辦法，是正確的」。但是毛澤東在7月28日決定撤了工作組。1966年8月5日，中共中央發文件撤銷6月20日的文件，說那是「錯誤的」^⑬。

在紅衛兵打死老師發生之後，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了一百萬紅衛兵。第一個打死老師的學校——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紅衛兵宋彬彬在天安門上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袖章。毛澤東問了她的名字是「文質彬彬」的意思後說：「要武嘛。」^⑭雖然從當時公開發表的文字上，我們沒發現毛澤東說過要打人，但是打人是他引導和鼓勵的結果。

1966年8月18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紅衛兵宋彬彬在天安門上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袖章。毛澤東問了她的名字是「文質彬彬」的意思後說：「要武嘛。」雖然從當時公開發表的文字上，我們沒發現毛澤東說過要打人，但是打人是他引導和鼓勵的結果。



一個需要解釋的問題是：即使對於毛澤東宣稱所要的「奪權」和「教育革命」來說，打老師也無必要。手無寸鐵的老師們猶如一群羔羊，那麼，為甚麼還要打他們呢？為甚麼要折磨他們甚至把他們打死呢？

上面寫到的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卞仲耘副校長，在被打死的前一天，已經被學生用民兵訓練用的木槍捅傷，她回家說：「他們打死一個黨員，一個教員，不過像打死一條狗。」她束手待斃，但是留下了一個解釋。有些被訪者認為還是可以從毛澤東的革命需要的角度找到原因的。通過年輕學生這種非常殘酷的行為，就能徹底摧毀原有的社會法律秩序和道德觀念，不久後把國家主席劉少奇也未經審判就關押虐待至死。

早期紅衛兵的一段地位大顛倒的經歷，也可說明最初打老師對後來打「走資派」的直接功能。在北京的學校，幹部子弟最早發起紅衛兵組織及開始打人，但幾個月後，當這些人的父親，即所謂「當權派」也成了「革命對象」時，打人的手段似乎就被順勢用到了他們父親的頭上。

然而，為甚麼中學生比大學生在打人時來得更嚴重和殘酷？有人認為還有別的原因。

(2) 紅衛兵組織的作用

當時打老師是在群眾性的場合很多人一起打的。由一個或數個人發起，更多人一齊湧上。打死了人，是大家打死的，不是某個個人的責任，加上事後無

人追查，所以打的人有恃無恐，越打越兇。如果沒有紅衛兵組織的出現，這種集體打人事件是很難發生。

紅衛兵和類似的學生組織是先在中學出現的，而且一開始就很具侵犯性。1966年6月2日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貼出的第一張大字報說：「凡是違背毛澤東思想的，不管他是甚麼人，不管他打着甚麼旗號，不管他有多麼高的地位，統統都要砸得稀爛。」^⑮這還僅僅是語言上的「砸」。

7月1日，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學生的「紅旗戰鬥小組」邀請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去北大附中一起慶祝共產黨的生日，全體學生都到了會場。在會場上，用一道糾察線把「紅五類」出身和「黑五類」出身的學生隔開，後者坐在最後面。這是在學校裏從未出現過的。後來，北大附中在「工作組」撤出後最早大打老師。7月底8月初，紅衛兵組織在北京各校普遍成立，「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渾蛋」的對聯迅速傳開。這種以家庭出身為組織成員首要條件，是很特別的。當時紅衛兵的領袖和早期成員很多是高級幹部子弟，而打人是一種特權。紅衛兵打老師，打「牛鬼蛇神」，也打「出身不好」的同學。當時國家主席劉少奇的一個女兒，在她父親後來被打倒以後，有人問她是否在1966年8月打死了3個人，她回答說：「那時候打死人光榮，我就吹牛說打死了3個人。」1966年她14歲。打死人是她那時「吹牛」的內容。

從一開始，「紅衛兵」名稱的意思就是「保衛毛澤東」。毛澤東沒給他們甚麼物質利益，但給了他們生殺予奪之權。紅衛兵的行動曾被稱為「造反」，實際上卻是在最高權力者的支持下迫害、虐待那些任憑凌辱宰割，死也不可以還手的老師和同學。

1966年的「紅衛兵」，具有三個特點：狂熱的領袖崇拜、以一種先天條件為接納成員標準、以及暴力行為，這三者之間是否有一定的聯繫，實在是需要研究的問題。從希特勒的青年組織也可看到這三個特點。這種相似說明了對這個問題的研究可能具有相當普遍的意義。

(3) 人性惡

有的被訪者認為以上兩項不能構成學生打人的充分條件。學生打人的手段，全是沒有人教過的，可是卻如此殘忍。打的後果如此可怕，打人的卻毫不在乎。當時的中學生年齡在14—19歲之間，大學生20—25歲，都已受過7年以上教育，大多高於中國人的平均受教育年數，不能用「無知」來作藉口。在打人時提出的被打者的「罪行」，即使按照當時的荒唐標準，也遠不能落實定案，但是一些學生大打出手，顯然是他們自己要這樣作。他們用別人的痛苦和生命來換取痛快，發泄自己的惡氣，渲染自己的革命形象。「文革」前老師和學生之間的關係確有緊張之處，比如有的學生考試不及格，有的學生被老師批評。但是，因此藉「文革」之機打老師，這樣報復實在太過分。這些案例都可成為「人性惡」的例證。這也許可以解釋為甚麼中學生打得比大學生厲害，他們因受教育少而可能保留了更多與生俱來的東西。

不過也有人認為這種解釋太一般化，對於說明一個特別的歷史現象難有太大幫助。

學生打人的手段，全是沒有人教過的，可是卻如此殘忍。這些案例都可成為「人性惡」的例證。這也許可以解釋為甚麼中學生打得比大學生厲害，他們因受教育少而可能保留了更多與生俱來的東西。

五 打老師之後

1966年8月20日左右，打人風從北京的學校蔓延到社會，被打的人從老師擴大到各種人：「地、富、反、壞、右」、演員、作家、民主黨派成員，以至共產黨的各級當權派。同時，「大串連」把打人風帶到全國。

在1966年被打的老師，如果不是「當權派」而又沒有別的問題，在1966年11、12月間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時就被允許離開「勞改隊」；如果是，則不能。北京第五十二中學打死一名女教師，北京第六中學打死一名工友的事，曾在1967年2月的群眾自辦的小報上遭到譴責^⑯。但是被打死的學校領導人或被認為「有問題」的人長久不被提起。12年之後，根據1978年夏天的《北京日報》報導，那時候一些區、縣為被打死的校長們開了昭雪大會或追悼會^⑰。這時有死者家屬要求法院追查懲辦與打死人有重大關係者，但卻被告之「已過追訴時效期限」^⑱。

1968年開始進行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老師再次成為運動重點。但是這次不是由學生自己組織，而是在「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領導下進行的。清華大學整老師的「經驗」傳到全國，是當時所謂「六廠二校經驗」的一部分。打人的事情仍然發生，只是一般不像1966年8月那樣公然地在很多人面前大規模地進行，而是常常個別施用。清華大學電機系的一位教授被用布條蒙起眼睛打。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1966年「八五」慘案的倖存者胡志濤副校長被學生輪流連續鬥過48個小時，不准她睡覺，逼她「交代問題」；3位老師自殺身亡，其時都在40歲左右，最年輕的一位僅35歲。在江蘇儀徵實驗小學，除了校長，有7位老師因「黑五類」出身等原因挨鬥挨打，其中有一位剪喉管自殺，剪斷聲帶，未死致殘。

被訪問者中有一位說，在她住過的北京農業大學教工宿舍9號樓1門洞，從一層到四層共住11家人，「文革」中有3家的5口人自殺了。但是，我們不知道在「文革」中一共有多少老師無辜身亡。

1966年在校的大中學生，從6月停課後再也沒有上過課。他們在數年以後先後離開學校。

六 四分之一個世紀後的反思

在90年代，當年的老師和學生怎樣想呢？

(1) 從歷史的角度：「文革」前的教育方式是否與暴力行為有關？

近幾年來，在1966年被打的老師中，開始有人因年事已高而去世。有一位在1966年被嚴重打傷的中學校長說，現在是檢討以前的教育方式的時候了。在「文革」開始以前，1964年以後，在壓力下，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領導把學生幹部大量地換成高級幹部子弟，單獨給幹部子弟聽政治報告，給他們和其他學生不同的政治待遇，強調階級關係。紅衛兵提出了「造反」，把老師當成敵人。1966年6月「工作組」進校以後，鼓勵學生上綱上線批判學校領導，但是不許打

人。紅衛兵反「工作組」。「工作組」被毛澤東撤走後，就發生了打老師事件。教育屈從於強權，放棄了教育的標準和平等原則，失落了教育的尊嚴，也埋藏了日後的災難。

(2) 從道德的角度：不道歉的一代？

在1993年夏天，前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副校長胡志濤說，她收到過一個學生寄給她的一本掛曆和一封信。這個學生在信裏為1966年8月打了她表示道歉。儘管這是27年來她收到的唯一一封道歉信，她表示原諒打了她的學生們。但有一位老師不同意。她說，道歉不道歉，對老師們來說現在其實沒甚麼，問題在於這些學生，他們參與了打死人的事件卻不道歉，他們還有沒有良心？中國的老師不教學生關於天堂和地獄的思想，但是人應該對自己做了的壞事有內疚感和負罪感。

(3) 這是不是「革命」？

在四分之一個世紀過去之後，少數的「文革」參與者仍然認為紅衛兵當時所作的並不太錯，因為那是一場「革命」，方向正確，手段不那麼重要。但是多數身臨其境的被訪者都覺得，那場運動無論是手段還是方向都是錯的，我們不能再讓「文革」中的學生打老師或類似的事情再次發生，不論其是否再用「革命」的名義。

1993年夏天，前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副校長胡志濤，曾收到一個學生寄給她的一本掛曆和一封信，這個學生在信裏為1966年8月打了她表示道歉。儘管這是27年來她收到的唯一一封道歉信，她表示原諒打了她的學生們。

註釋

- ① 高舉，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
 ②⑥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頁86：48。
 ③ 在這個名單中，帶*號的學校有老師被打死。但是被打傷後自殺的人未被計入。另外，學生打死了學校外的人也未被計入。

中學：

北京第四中學	北京清華大學附屬中學	上海復興中學
北京第八中學*	北京師範大學第二附屬中學*	上海大同中學
北京第六中學*	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	上海上海中學
北京第十五中學	北京師範學院附屬中學	上海七一中學
北京第五十二中學*	廣東台山縣一中	上海南洋模範中學
北京第八十中學*	廣東第七中學	上海第二女子中學
北京101中學*	廣東第十六中學	上海第三女子中學
北京第一女子中學*	廣東第二十五中學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附屬中學
北京第二女子中學	廣東第五十七中學	上海外語學校
北京第三女子中學*	廣東第六十二中學	上海新成中學
北京第四女子中學*	杭州第一中學	四川洪雅縣中學
北京第五女子中學	南昌第八中學	四川西南師範學院附屬中學
北京第八女子中學	南京師範學院附屬中學	廈門第四中學
北京礦業學院附屬中學	南京第二中學*	天津北郊區南倉中學
北京大學附屬中學	南京外國語學校	天津105中學
北京景山學校	陝西師範大學第二附屬中學	

小學：

北京禮士胡同小學	江西樂平縣大寺上小學	南京南昌路小學
北京海澱區老虎洞小學	江蘇無錫后寶小學	上海南匯縣惠南鎮小學
北京玉泉小學	江蘇儀徵實驗小學	天津紅橋區金鐘橋小學
北京中古友誼小學	江蘇鹽城縣城中小學	天津河西區西南樓中心小學
北京寬街小學*	江蘇揚州市灣頭公社中心小學	天津南市小學
江西廬山第一小學	南京林學院子弟小學	
江西南昌市羊子小學	南京三牌樓小學	

大學：

北京大學	中央美術學院
北京農業大學	中央音樂學院
清華大學	北京建築材料工業學院
北京師範學院	北京鋼鐵學院
華東師範大學	

幼兒園：

北京中山公園幼兒園(是中學的紅衛兵來打了幼兒園的老師)

④ 作者當時是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學生，看到打人的經過，曾為此寫過〈女性的野蠻〉一文，收於我的《校園隨筆》(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

⑤ 見蒯大富6月16日大字報，收入清華大學井岡山紅衛兵宣傳隊編：《清華大學大字報選》(1966)。

⑦ 據其中一人和作者的談話，1993年9月10日。

⑧⑬ 見中國人民解放軍黨史建政工教研室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北京：1988)，頁91；49、70。

⑨ 毛澤東：《毛澤東著作選讀·甲種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⑩ 這是由蕭衛平(1966年北京中學生)從計算機網絡上寄給我的，並請譚馥(1966年天津中學生)做過核對。譚提供的歌譜不同，但詞是基本一樣的。兩地唱法不同。

⑪ 《人民日報》1966年6月1日社論標題是〈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⑫ 《人民日報》1967年5月17日發表，用黑體字印毛澤東寫的句子，在1966年5月時僅在共產黨內傳達。

⑭ 〈我給毛主席戴上了紅袖章〉，《人民日報》，1966年8月21日，第二版，文章署名「宋要武(宋彬彬)」，表示她已改名。

⑮ 這張大字報的標題是〈誓死保衛無產階級專政！誓死保衛毛澤東思想！〉見大字報選。

⑯ 見首都中學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宣傳部主辦：《中學文革報》，第二期，1967年2月2日。

⑰ 〈為一批中小學領導幹部昭雪平反〉，《北京日報》，1978年7月16日。在這篇一千來字的報導中，列出了13個1966年的死者名字，但未提他們是被打死的。

⑱ 見「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檢察院不起訴決定書」，(80)西檢審刑字第72號。

王友琴 1982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1988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獲博士學位後，任教美國斯丹福(Stanford)大學至今。出版有《校園隨筆》、《魯迅和中國現代文化震動》等書和〈文化：反省「文革」的一個角度〉、〈孝與俄里普斯情意結〉等論文。